

首次用小说完成故宫文物南迁叙事，《国宝》作者祝勇说——

读懂故宫，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

文物离开北平紫禁城，开始漫长的迁徙。

2025年，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。是年春天，故宫博物院研究员、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、作家祝勇用本文开篇那个句子，展开了长篇小说《国宝》的叙事，为这部60万字的鸿篇巨制，埋下了伏脉千里的草蛇灰线。近日，祝勇接受了新重庆—重庆日报记者专访。他说：“素以坚韧、忠勇著称的重庆，在这段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”

记忆重构

“故宫文物南迁的很多细节栩栩如生，在我心里呼之欲出，我觉得不写小说不行”

“600年的宫殿、7000年的文明，一个人走进去，就像一粒沙被吹进沙漠，立刻不见踪影。”从2002年的首部故宫主题作品《旧宫》出发，祝勇开始与故宫持续对话。20余年来，“故宫”已成为他鲜明的文学标签。

“故宫是最好的历史现场，是我写作的灵感之源。她不只是我的写作对象，更是我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窗口。故宫文物南迁历史非常重要，我将它视为立足故宫观察中国史的新探索。”两年前，祝勇以非虚构作品《故宫文物南迁》填补了南迁历史书写的空白；如今，两卷本的《国宝》成为了南迁叙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故宫文物南迁有多重要？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又觊觎华北，故宫文物危如累卵。为安全考虑，故宫博物院牵头组织本院所藏的部分文物和北平古物陈列所、颐和园、国子监等处的1.9万余箱，分批南迁：文物被运离北平，先至上海、南京，后又分南、中、北三路，水陆并进向西南大后方疏散。分别辗转至贵州安顺、四川、重庆、陕西汉中，最终转移至四川的巴县（今重庆巴南区）、乐山和峨眉临时库房存放。这场历时20余载、横跨10余省市、行程数万里的文物南迁行动历经磨难，但相关文物几乎无一损毁、遗失，基本完整保存。

“站在今天来看，那段历史更像是一段神话。一方面是因为它距离今天足够久远，有关它的细节已漫漶不清；同时也因为它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常识相悖。因此，不断书写，很有必要。”祝勇说，非虚构作品完成后，他依然觉得有很多话想说，“非虚构作品的主要任务，是对故宫文物南迁作一个大而整的脉络叙述，没

有足够的空间去挖掘人物的情感。故宫文物南迁的很多细节栩栩如生，在我心里呼之欲出，我觉得不写小说不行。”

聚焦个体

“故宫文物南迁牵涉人、事、物众多，归根结底是要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，来表达一个时代的精神”

过去20多年里，祝勇的故宫写作主要在散文领域。他认为，散文更多要靠作者对于某个事物的感受，通过一种认知的思考来呈现文本，小说则要讲求叙事，在叙事之上，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人物的塑造。“小说要贴着人写，归根结底是要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，通过人物的精神面貌，来表达一个时代的精神。故宫文物南迁牵涉人、事、物众多，细节纷纭，如何从中找到一个故事主线、人物主角？我从参与文物南迁的学者、知识分子、工友中寻觅，最后决定聚焦一个普通个体。”

小说《国宝》围绕主人公那文松护送石鼓等故宫文物南迁展开，从他个人的家庭悲欢离合映射出整个文物南迁历史。当时文物从北京到了上海、南京，又继续撤退至大西南，分为北、中、南三条路线。小说里的主人公那文松负责护送文物撤退走的是北线，属于三条线中的重点：沿陇海铁路西行，先存宝鸡，后穿越秦蜀古道，迁于汉中、成都、峨眉各处。

围绕那文松和身边人的视角，读者眼前展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特殊的一场迁徙图景：没有难民，没有枪炮，唯有穿草鞋的学者、扛木箱的挑夫、驾卡车的士兵，寒夜里护送文明的星火向南逃亡。十数年间，过长江、越秦岭、入川渝，文物箱的辙印与故宫人、抗战将士的血痕在中国版图上交错成河山图谱。无数无名的人参与运输，通过文学的显微镜，让那些消散在历史迷雾中的“那文松”们重获面容。

重要节点

“战时重庆用有限的物资条件和巨大的乐观、包容精神，为故宫文物南迁提供了坚实支撑”

书中对战时重庆的书写细腻而感人。彼时的重庆虽然随时可能遭遇日军轰炸，但市民生活却生动鲜活，大街小巷一派积极乐观

的景象。

为了故宫文物南迁写作，祝勇曾多次到访重庆。在他看来，作为反映故宫文物南迁这一重大历史的长篇小说，《国宝》必然要有相当的笔墨来写重庆。“1937年，在淞沪会战以及南京保卫战的背景下，已经从北平迁到南京的故宫文物紧急迁出南京，开始分成北、中、南三路进行西迁。中路是从南京出发走长江，经过武汉，抵达重庆；南路是从南京到武汉，向南经过长沙、桂林，再抵达贵州。但随着战局的发展，重庆、贵阳这样的西部地区也遭遇了大轰炸，所以，重庆存放的中路文物，继续西迁到了乐山，南路的文物又从贵阳到达了四川巴县（今重庆巴南区）。抗战胜利后，北、中、南三路文物集中在重庆。然后，大部分文物又从重庆出发返回南京。所以，在故宫文物南迁进程中的西迁和东返两段过程里，重庆都是特别重要的节点。”祝勇如是说。

小说进入重庆部分时，为何以风和日丽起笔，随即笔锋一转，让主人公目睹一场狂暴轰炸的屠杀？“这是有意为之。”祝勇说，重庆自古为长江上游重镇，烟火繁盛，小说进入重庆，通过勾勒普通国民日常生活场景去跟侵略战争的惨烈形成反差对比，实际上是用另一种方式控诉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的巨大的伤害。“这种对繁华市井的描写和对战争惨烈景象的描写，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，相辅相成，表达了对侵略暴行刻骨铭心的痛恨。”

书中不仅写了重庆大轰炸，还写了四川嘉定（今乐山）大轰炸。祝勇颇为感慨的是，面对战火，川渝人民的坚强乐观，也为故宫文物南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。“这种坚强乐观是很值得学习的一种品质，让故宫人在西南大后方感受到强烈的信任感。我在调研采访过程中有许多切身体会，比如我在重庆看到一张大轰炸后的历史照片，楼房已经被炸塌了一半，但另外一半作为饭店还在照常营业，还在卖包子、油条之类食物。还有在一片废墟里，重庆人还在打麻将。你看，炸归炸，日子还照常得过。战时重庆用有限的物资条件和巨大的乐观、包容精神滋养了坚守抗战的人民，更为文物南迁这一保全中华文明的重大事件提供了坚实支撑。”祝勇注意到，重庆不久前提炼出“坚韧、忠勇、开放、争先”的城市精神，他认为这一表述语高度契合重庆的城市特质，承载往昔，映照未来，概括了这座城市一路走来的风骨

与灵魂。

以史为镜

“回望九死一生的这条史无前例的国宝‘流亡路’，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次精神洗礼”

文物有情，文脉相牵，大国器物之上凝结的是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。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曾说：“故宫博物院最大的价值，在于希望人们在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要有反思、有鉴戒、有以历史为镜的态度，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。”在祝勇看来，故宫文物南迁历史对于今人也有“以史为镜”的意义，“文物南迁九死一生，多年后大部分重返北平，回望这条史无前例的国宝‘流亡路’，不单对故宫人，我想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次精神洗礼。”

以《国宝》为题，祝勇全力以赴，孜孜以求，以这部长篇小说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构。祝勇希望深掘藏在文物背后的人性、人心，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探寻文明变迁和精神来路。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源于五千年历史文脉，岁月交替，文脉赓续，在今天依然在滋养着我们。”他说，在古代中国人的文化观里，往事并不如烟，“它可以通过物质凝聚、固化。人所创造的物质是一个精神综合体，是历史，是哲学，也是法度。”

从2002年的《旧宫》算起，《国宝》已经是祝勇笔下第12部故宫主题作品了。20余年，洋洋洒洒数百万字，祝勇构建起的“纸上的故宫”，亦是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线。

执着书写故宫的根源，在于祝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痴迷。如今，已经成为新时代资深故宫人的他，这样回忆与故宫的几十年缘分。“我大学毕业留京工作，经常逛故宫，故宫的美我怎么都看不够，至今我去看那些巨大的宫殿仍然无比震撼，因为故宫的确涵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，渐渐地故宫就成了我的写作主题。”祝勇表示，“从器物、历史等不同面向的丰富角度去不断书写故宫，可以呈现一个开放的故宫，一个让文物活起来的故宫，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故宫、读懂故宫。读懂了故宫，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就是中国人的‘精神家底’，它将永远滋养我们的心灵。”



祝勇
孙佳妮 摄

■新重庆—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

“不管过去了多少年，梅遇影依然清楚地记得，丈夫那文松在薄雾中走出家门的那一天，是公元1933年2月5日。”

这个富有韵律的句子简洁有力，在看似从容不迫的氛围中，那文松和梅遇影的命运渐渐“失控”，涓涓细流的儿女情长与波澜壮阔的家国情怀奇妙合流。他们的人生，即将开启未知的旅程。

那未知的旅程，与故宫文物南迁的隐秘征途密不可分：1933年2月，山河飘摇之际，如那文松般的故宫人，带着首批13427箱零64包

【百本好书送你读】

《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》 看杨素秋在西安造梦



■姚伟民

1000多年前，李白来长安寻梦，最终却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差了“三万里”。

1000多年后，杨素秋在西安造梦，哪怕隔着“三万里”的距离，她也在努力让区县图书馆的梦想照进现实。

这个苏州大学博士毕业的80后，在陕西科技大学教书的老师，凭借着一次在西安市碑林区文旅局挂职锻炼的机会，迈出了大学校园。当她真正面对嗷嗷待哺的群众时，她的想法是为碑林区建成一座图书馆。

然而，当一个理想主义者进入官场，欲将想法付诸实际时，她才发现，面临着重重阻力。充满形式主义的文件，“报喜不报忧”的宣传方式，唱高调、不落实的工作态度……这一切的一切都横亘在杨素秋面前，几乎成为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。

更加糟心的是，她不仅面对着充满惰性的体制，还要面对着并不“文明”的群众。她在书中写道：“实地调查结果出乎意料，许多老百姓不清楚图书馆是做什么的。我去了五家社区服务中心，遇到的人都没听说过附近新开了图书馆。”他们对图书馆的误解令人啼笑皆非，有人询问图书馆的书卖不卖，打几折，有人站在图书馆门口徘徊，担心里面按小时收费……

上上下下的阻力似乎也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写照，小时候“中原北望气如山”，长大后“求田问舍”，只求求得温饱。于是，平凡成了我们的共同标签。但是，任何时代总不乏杨素秋这样的人，他们怀着对时代的悲悯，即使有无法跨越的大山，他们也在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奔走呼吁。

杨素秋呼吁方式是著书写作，于是我们看到了《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》这本纪实文学作品的问世。

在书中，我们看到了理想、美好与希望，至少有两个人令我印象深刻。

一个是“小小志愿者”乐乐。8岁多的乐乐读三年级，在把图书整理上架的过程中，她自己先被拖车里的绘本吸引，竟全然忘记了自己是“图书管理员”。她倚着车看书，又把妈妈拉过来念给她妈妈听。从一个一个“小书虫”到“管理员”，乐乐以一种可爱的姿态让我们看到了人们对书籍的着迷。

另一个是盲人读者杜斌。他开了一家盲人按摩店，帮“我”按摩时和“我”一起聊毕飞宇的《推拿》。他们有个小小的读书团体，聚在一起讨论时，有的盲人说毕飞宇写的盲人世界不完全准确。但杜斌却不这样认为，他理解毕飞宇，认为毕飞宇把盲人的感受还原了百分之八九十。尽管在很多事上，他都要比正常人多做几遍，但是他热爱生活，热爱读书。“他看不见大海，但舍不得走，在水里站了很久。”这大海，不仅仅是他去过的青岛海滩，更是他心里波澜壮阔的“大海”。

每个有趣的人都和乐乐一样，对某种事物着迷；每个热忱的人都和杜斌一样，凭借心里的波澜壮阔抵御生活的不幸与不公。而作者正是如此，她对书着迷，半生钻在书里，她想让书惠及更多的人，于是她致力于为市民建造一个图书馆。这个宏伟蓝图并不容易照进现实，但是无论经历怎样

艰难困苦，我们还是看到了碑林区图书馆的建成。

现在，让我们来回答一个终极问题，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？

如果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话来说，图书馆应当是人间天堂；如果用杨素秋从教科书中总结的话来说，是因为图书馆有三大功能：一是保留人类文明优秀成果，二是宣传教育，三是满足和提升群众阅读需求，最大程度实现公益性和公平性。我想，杨素秋真正的目的，想必是致力于满足和提升群众阅读需求，最大程度实现公益性和公平性。

尽管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，但我们发现，已经有许多仁人志士竭尽所能去弥补它们。而杨素秋正是其中一位。虽然她挂职时碑林区图书馆并没有建成，但我们知道，这座图书馆的最终建成与她的推动有着很大的关系。

杨素秋曾在2024年的一次采访中，谈到了“一边做官一边自省是可能的吗”这样的相关话题，从她的经历来看，是可能的。作为挂职干部，她真正有着一颗为民服务的心；作为知识分子，她试图让梦想照进现实。

这世上熙熙攘攘有许多人，来来往往有许多事，抛却功利利禄外，总要有一些人，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，真正地把福祉落实到人民群众手里去。我相信，区县图书馆会越来越多，那些尚未被知识照亮的角落，终要被照亮。



电子书
有声书
扫码即可
阅读、收听

近悦远来书香重庆
书评投稿邮箱：cqrbdsb@163.com

《王氏之死》 透过历史切片向我们传递温度



■泥文

小人物命运的运行是事件发生的本身，也是时代进程中编年史的落脚点。这是我看了历史性叙事书籍《王氏之死》产生的想法。

美国诗人詹姆斯·梅里尔说：“逝去的，被埋葬了吗？还是又一块缺失的碎片？”很显然，历史学家史景迁（美国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、汉学家）用他的方式从大量的史料中捡拾散落的历史碎片，缝补1668年到1672年间发生在山东郯城人身上故事，为我们勾勒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切片，让我们从中去认识、感受和体悟那个历史阶段的中国，客观地反映社会发展中的不可抹掉的事实。

《王氏之死》是介于历史和小说之间的一种叙事文本，使人读来轻松易懂、易记，不像学术性太强、太专业化的历史读物那样呆板，却是在尊重历史、书写历史的情况下展开的。据附录，其参考文献达56种之多，注释数百条之多，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史景迁在动笔之初是做了大量的考证和功课的，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可见一斑。《王氏之死》的写作，史景迁是持悲悯情怀的，在还原一些故事的情况下，揭示了清朝时期的平民、小人物，在政治境况和自然境况双重盘剥

之下的艰辛苦难程度，且在女性身上凸显得更加淋漓尽致。

史景迁在序里说，《王氏之死》是在4次小危机的背景下进行观察和写作的。一次是“土地耕作及赋税征收”，一次是“一名寡妇试图保护其子嗣及遗产”，一次是“地方恩怨引发的暴力事件”，还有一次是“姓王的妇人无法再忍受生活现状，选择逃离郯城”。就本书的组成部分看，书名为何叫《王氏之死》？正如史景迁所言：“本书始于妇人王氏，自然也终于王氏。”也就是说，她引我进入郯城，引我发现郯城历史的悲悯，引我第一次了解一个在所有可见的财富、影响力和权力都分配不均的边缘县城。”

郯城在清朝康熙年间及以前是什么样子的？据1668年任郯城知县的冯可祥，1670年任郯城知县的黄六鸿编纂的《郯城县志》，以及黄六鸿卸任后的回忆文章显示，郯城在天灾（地震、蝗虫、洪水、雪灾等）、人祸（白莲教、土匪、清军入关等战乱）面前，地震死之、匪患、兵乱杀之，无食饿而死之……“四年之奇荒，七年之地震，田禾颗粒无收，人民饿死大半。”有因无法生存而自尽的，也有因生存而卖妻卖女的。尽管在如此条件下，赋税、兵役的摊派并没有因此而减少，成为悬在郯城人民头上的一把血淋淋的利刃。本就弱势的女性群体，在这样的境况下就更不值一顾了。

《王氏之死》引用了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里《盗尸》《上仙》《偷桃》《绛妃》《促织》《绩女》《细柳》等故事。借他收集的来自亲友讲述、游历见闻的民间轶事，为《王氏之死》的写作铺陈肌理。这些奇闻异事、奇思妙想的故事，从表面上看，史景迁对它们解读阐述，其实他是用了一种反证的手法来证明是时大环境

下平民、小人物的生存状态，用这种状态来反映社会客观存在的事实，也用这种方式让那一时期发生在郯城人身上的故事活泛起来。

《王氏之死》涉及的妇女故事不只是王氏，作者还列举了一些比较典型的故事。当然，多数是借了蒲松龄之手，也深入到了大清律例的底色。如，“其改嫁者，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，并听前夫之家为主。”“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，合承夫分，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。”也因这些条例给成了寡妇的妇人带来了悲惨的命运。族人会想方设法让守寡的女人改嫁，以期获得本该属于她的财产。更有甚者，用计谋杀掉守寡妇人和她的孩子来占有其财产。如《郯城县志》有简短传记：“是时，家业尽空，兵荒盗起，人无宁居。氏以弱孀幼子，孤伶苦守。族人又逼嫁而谋其产。氏毁容破面，死不再适。”诸如此类，无一不彰显了女性的弱势地位和弱肉强食的本色。

作为一位外国汉学家，史景迁站在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角度，去挖掘王氏所代表的广大底层女性的悲惨命运，以及这种命运背后深刻的社会根源。我们能看出他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同情，这是他试图跨越历史与文化鸿沟，以一种更贴近人性的方式，让我们感受到历史中那些被忽视的平民、小人物的温度。

《王氏之死》是一部文学性比较强的历史读本，作者用严谨的笔触挖掘史料，借《聊斋志异》故事里的奇幻，为我们与彼时的平民和小人物之间搭建了一个通道。其用笔是理性与悲悯、事实与想象、沉重与浪漫相互糅合、相互渗透的。他用层层剥茧的方式给我们展示了清朝时期郯城人民的情状。彼时政治与经济、自然与人文、朝堂与民间、男性与女性等之间的关系具现，如亲眼般震撼人心。